

路易·艾黎：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

2019年8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看甘肃时指出，山丹培黎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职业学校。路易·艾黎提出“手脑并用，创造分析”的办学宗旨，对今天我们发展职业教育依然有借鉴意义。

新西兰人路易·艾黎是中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国际友人。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，在中国生活了60年，直到1987年12月27日去世，是中国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和参与者。

从国民政府技术顾问到“亲共危险分子”

路易·艾黎，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，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，母亲是家庭教师。艾黎有兄弟姐妹6人，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。1916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，中学没毕业的爱黎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，曾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。在此期间，他结识了几位中国人，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，派出华工到欧洲帮助英法对抗德国。这些中国人吃苦耐劳，给艾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从这些中国人那里知道了这个人口众多、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，就很想想到中国来看看。1921年以后，中国大革命的消息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，更增强了他要来中国的愿望。

1927年4月，30岁的艾黎抵达上海。1927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公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、工业督察长等职。在此期间，他目睹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，以及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，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抱有极大的同情。他很想找到改善中国劳动人民处境的答案，在朋友的推荐下，开始读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也看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，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国内局势，并努力为贫苦民众做些事，如赈灾工作。正是在赈灾工作中，他看到了国民党官员对民众疾苦的麻木不仁，也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工作的井然有序，更加想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。1934年，艾黎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，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，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。他不顾个人安危，把自己的住所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电台的据点，利用工部局拨给他的专用车，多次替上海地下党运送材料、转移革命同志。在红军反“围剿”战争中，他积极为前线红军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中国工业遭到严重破坏，大批难民流离失所。为了组织经济力量抗战，1938年，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。“工合”运动得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，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卡尔。卡



尔大使把工业合作的计划介绍给蒋介石，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看到这个计划也表示要赞助“工合”。在此契机下，路易·艾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技术顾问，代理“工合”总干事。

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势头正猛，艾黎计划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，生产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，以支援中国抗战。他迅速集合了一批有才干年轻人，先是在汉口建立起机构，并开始实施把武汉的企业迁往西北，很快在陕西宝鸡建立起中国“工合”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——西北办事处。宝鸡很快建起了多家合作社，开始生产鞋、食品、棉纱、毛毯、毛巾等生活用品和军需品。艾黎又在凤县成立“工合”双石铺事务所，先后建立机器、造纸、制革、纺织、供销等多个合作社，以及小学、幼稚园、招待所、医院等，还吸引了不少国外捐款。这些生产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、援助人民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。随着“工合”运动不断发展，很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加入其中，这使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，他们把艾黎看成是亲共危险分子，并于1942年9月解除了他国民政府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。

兴办培黎学校

为了给“工合”运动培养管理和技术骨干，艾黎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。“培黎”包含着“为中国的黎明培育新人”的深意。学校条件很艰苦，只有3间房子、十几名学生，校长换了一个又一个，直到年轻的英国人乔治·何克担任校长，情况才稳定下来。艾黎和何克起早贪黑，努力工作，集中精力培训工农子弟，他们要用自己的实践证明，技术领导人是可以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来的。由于受到反共势力的干扰，学校于1944年迁至地域偏僻、国民党统治较弱的甘肃古城山丹。山丹培黎学校开办后不久，何克就不幸病逝，艾黎独自挑起了办学的重任。

在山丹的9年生活，对艾黎来说是最艰苦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。他把为广大劳动人民培育实干的技术人才作为办学宗旨，认为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农村。培黎学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，艾黎希望这些能吃苦耐劳的贫苦孩子，受到教育后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并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。

他为学校确立了“手脑并用、创造分析”的教育思想，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，要求学生不仅学习课本知识，还要具有实践和创新的能力。他认为教育重在唤醒学生的创造性，培养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。他重视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、健壮的体魄，从而适应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。培黎学校实行半天上课、半天生产实习的教学方式。全校师生自己动手修建校舍，安装机器，开垦荒地。在短短几年时间内，学校根据山丹的资源 and 当地人民群众的需要建起了造纸、印刷、机械、化工、纺织、玻璃、皮革等20多个实习场地和1所医院。在艾黎的教育思想指导下，山丹培黎学校培养了许多既有吃苦耐劳精神，又有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。

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，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，帮助运送解放军部队，为解放玉门等地作出了贡献。1953年，学校迁往兰州，改名为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，后又发展为现今的兰州城市学院。

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国际友人

1953年后，艾黎定居北京，开始了他作为“和平与友谊”使者的生活——为让全世界正确地了解新中国而努力。他把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的的生活作为自己新的工作。他参加国际和平会议，到各地参观访问，用客观报道和新旧对比的方式，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。此外，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文，翻译了许多中国优秀的诗歌，包括几十部著作和十多种译作。他通过手中的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，为中国广交朋友作出了贡献。

无论是在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，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，时时想的是如何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，如何改变中国内地的落后面貌。艾黎终身未娶，但收养了一些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。艾黎去世后，按照他的遗嘱，将其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乡山丹。艾黎将毕生心血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，不遗余力投身于中国抗战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很多人像艾黎一样，来到中国时只是普通人，但是他们进入了中国历史变迁的洪流，被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所感召，变成了不平凡的人。

艰辛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

□ 曹 普



1959年，黑龙江大庆油田工人欢呼第一口油井试喷成功

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之间的矛盾；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，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；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；提出要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；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、文化建设以及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；等等。

党的八大以后不久，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了曲折。1957年出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；1958年发动了“超英赶美”的“大跃进”和“一大二公”的人民公社化运动。发动“大跃进”的出发点是为了以更快速度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，实现“超英赶美”，“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”“一个强国”，但是，由于超越阶段、急于求成，“大跃进”反而给我国造成重大损失，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。面对严峻形势，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考古学基础

□ 隋云鹏

类面对天、神、自然界取得了重大胜利，从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非宗教化基础、中国传统社会的世俗化基础。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一次重大转向，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、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，也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影响深远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关于帝喾的记载出现了“历日月而迎送之”的记载。“历日月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的专业术语。司马贞《索隐》引皇甫谧云：“帝喾名俊也。”文献多记载为“帝俊”。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楚帛书曰：“日月发生”“帝俊乃为日月之行”。考古学者冯时认为，“帝俊”与日中之乌“踆乌”以及良渚文化礼玉上的太一北斗神徽有着密切联系。

在《史记·历书》和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，有关帝喾的弟弟帝尧的记载，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天文学和历法，显示了帝尧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与发达。帝尧“复遂重黎之后，不忘旧者，使复典之，而立羲和之官。明时正度，则阴阳调，风雨节，茂气至，民无夭疫”。帝尧年老后，申戒帝舜“天之历数在尔躬”，舜亦以命禹，显示了天文学和历法知识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。对此，太史公指出：“自初生民以来，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？及至五家、三代，绍而明之。”

设和农业机械化、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，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布局的。1964年10月，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，有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，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。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医疗卫生事业成就可观。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、霍乱、血吸虫病、疟疾、鼠疫等疾病，或被灭绝，或得到有效防治。这10年间，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军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，其中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。正如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所指出的：“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，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；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。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。”特别是在这期间，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，抒写了无数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，培育和铸成了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。

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，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，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，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。改革开放前的艰辛探索及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为在我们党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、理论准备、物质基础。



五帝时代天文学和历法的进步有着坚实的考古学基础。在距今约5500年到5000年的河南中部巩义双槐树遗址中，人们发现了9个有意埋放的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，为“黄帝考定星历”提供了历史背景。帝尧时期天文历法的发达也已被陶寺遗址所证实。考古发现，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，相当于尧舜禹时期的陶寺文化，其天文历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出现了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现象台。尤其让人震撼的是，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遗址第三层台基芯由生土和夯土基芯构成，形成了阴阳“太极”图，体现了阴阳、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，体现出最高统治者天命所归、居中而治、掌握历法、敬授民时的权威。孔子赞美帝尧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实际上，考古学证据显示，上古天文学和历法的起源远远早于黄帝时代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规划显示出当时先民对春分、秋分、冬至、夏至等节气以及东宫苍龙、西宫白虎等星宿运行规律的掌握，对后世的宇宙体系、时空体系、节气体系、阴阳哲学和礼仪制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